

主编 李天纲
中国国家图书馆藏
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·历史学（第一辑）

A short history of England

英国史（上卷）

〔美〕季尼 (E. P. CHEYNEY) 著 余楠秋 等译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

主编 李天纲

中国国家图书馆藏

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·历史学（第一辑）

A short history of England

英国史 (上卷)

〔美〕季尼 (E. P. CHEYNEY) 著 余楠秋 等译



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英国史/(美)季尼(Cheyney, E.P.)著;余楠秋等译. —上海: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 2016

(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/李天纲主编. 历史学)

ISBN 978-7-5520-1270-5

I. ①英… II. ①季… ②余… III. ①英国—历史 IV. ①K561.0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61926号

英国史(上下卷)

主 编: 李天纲

编 纂: 赵 炬

责任编辑: 唐云松

特约编辑: 陈宁宁

封面设计: 清 风

策 划: 赵 炬

执 行: 取映文化

加工整理: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

责任校对: 笑 然

出版发行: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上海顺昌路622号 邮编200025

电话总机: 021-63315900 销售热线021-53063735

<http://www.sassp.org.cn> E-mail: sassp@sass.org.cn

排 版: 上海永正彩色分色制版有限公司

印 刷: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650×900毫米 1/16开

字 数: 500千字

印 张: 45.5

版 次: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20-1270-5/K.330

定 价: 216.00元(上下卷 精装)

民国西学：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

——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序

李天纲

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，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。来自欧美的『西学』，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，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，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。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，与当地文化交流信息，激发思想，乃至产生新的理论，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。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，公元九、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，有一场著名的『百年翻译运动』之外，还有欧洲十四、十五世纪从阿拉伯、希腊、希伯来等『东方』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，汇入欧洲文化，史称『文艺复兴』。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『西学』，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，称之为『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』、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并不过分。

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，其实早有前奏。梁启超(1873-1929)在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说：『自明末徐光启、李之藻等广译算学、天文、水利诸书，为欧籍入中国之始。』利玛窦(Mateo Ricci, 1552-1610)、徐光启、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，比清末的『西学』早了一百多年。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：利、徐、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、历算等『科学』著作，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《论灵魂》(《灵言蠡勺》)、《形而上学》(《名理探》)等神学、哲学著作。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『西学东渐』之始是对的，但他说其『范围亦限于天(文)、(历)算』，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二百年，直到今天。

从明末到清末的『西学』翻译只是开始，而且断断续续，并不连贯成为一场『运动』。各种原因导致了『西学』的挫折：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；受清初『中国礼仪之争』的影响；欧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，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。鸦片战争以后很久，再次翻译『西学』，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。从翻译规模来看，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、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，影响力却仍然有限。梁启超说：『惟（上海江南）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，李善兰、华蘅芳、赵仲涵等任笔受。其人皆学有根底，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，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、李。』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，但说『戊戌变法』之前的『西学』翻译只在上海、香港、澳门等地零散从事，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，则是事实。

对明末和清末的『西学』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，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：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，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『西学』，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『翻译运动』。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，数以千计的『汉译名著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。1905年，清朝废除了科举制，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『大学堂』的方式举行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『书院』系统改造而成。新建的大学、中学，数理化、文史哲、政经法等学科，都采用了翻译作品，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，于是，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，即在『四书五经』之外，还必须要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『西方经典』，甚至到了『言必称希腊、罗马』的程度。

我们在这里说『民国西学』，它的规模超过明末、清末；它的影响遍及沿海、内地；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，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、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，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，但从一般直觉来看，是可以成立的。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，以及『现代化』、『世俗化』、『理性化』，都与『民国西学』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。然而，『民国西学』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？它是一

个怎样的体系？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？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，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。还有，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，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？『西学东渐』的代表，明末有徐光启，清末有严复，那『民国西学』的代表作在哪里？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，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，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、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的『西学』著作，束之高阁，已经好多年。

举例来说，1935年，上海生活书店编辑《全国总书目》，『网罗全国新书店、学术机关、文化团体、图书馆、政府机关、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』。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，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，分为：『总类、哲学、社会科学、宗教、自然科学、文艺、语文学、史地、技术知识』。一瞥之下，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『人大图书分类法』更仔细，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、学说、学科、流派更庞大。尽管并没有统一的『社科规划』和『文化战略』，『民国西学』却在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。查看《全国总书目》（上海，生活书店，1935），在『社会科学·社会学一般·社会主义』的子目录下，列有『社会主义概论、社会主义史、科学的社会主义、无政府主义、基尔特社会主义、乌托邦社会主义、基督教社会主义、议会派社会主义』等；在『社会科学·政治·政体政制』的子目录下，列有『政治制度概论、政治制度史、宪政、民主制、独裁制、联邦制、各种政制评述、各国政制、中国政制、现代政制、中国政制史』等，翻译、研究和出版，真的是与欧美接榫，与世界同步。1911年以后的38年的『民国西学』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，而我们却长期忽视，不作接续。

编辑出版一套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，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著作重新刊印，对于我们估计、认识和研究『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』、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，接续当

时学统，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。1980年代初，上海、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、庞朴先生为代表，编辑『中国文化史丛书』，一个宗旨便是要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『中国文化史丛书』，重振旗鼓，『整理国故』，先是恢复，然后才谈得上超越。遗憾的是，最近三十年的『西学』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『接续』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，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，诸如控制论、信息论、系统论……还有『老三论』、『新三论』、『后现代』、『后殖民』等等新理论，对『民国西学』弃之如敝屣，避之唯恐不及。

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，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，单靠『严译八种』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，还受邀请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，几份报刊的主笔。但是，像王造时（1903-1971）先生那样在『西学』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，然后借此『西学』，主编报刊、杂志，在『反独裁』、『争民主』和『抗战救国』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。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《历史哲学》、摩瓦特的《近代欧洲外交史》、《现代欧洲外交史》、拉铁耐的《美国外交政策史》、拉斯基的《国家的理论与实际》、《民主政治在危机中》。1931年，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，文学院院长，政治系主任，后来创办了《主张与批评》（1932）、《自由言论》（1933），组织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』（1932）。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、法治、理性的自由主义，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、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（见王造时著《荒谬集·我们的根本主张》，1935，上海，自由言论社）。非常可惜的是，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、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，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，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，读不到，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。

我们说，『民国西学』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，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『断裂』之后，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，哪些可以继承和发展，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。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，我

们都没有再去翻看，认真比较，仔细理解。『改革、开放』以后，又一次『西学东渐』，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『西学』，用新的取代旧的，从尼采、弗洛伊德……到福柯、德里达……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：『熊瞎子掰包谷，掰一个丢一个。』中国学者在『西学』宝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，在层出不穷的『西学』面前特别害怕落伍。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：更新的理论，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，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，或者借用，来解决中国的问题。这种实用主义的『西学观』，其实是一种懒惰、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，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。

讨论二十世纪的『西学』，一般是以五四『新青年』来代表，这其实相当偏颇。胡适、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『西学』，倡导『启蒙』时居功至伟，但是『新文化运动』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，也使得这一派的『西学』浅尝辄止，比较肤浅，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『民国西学』。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《新青年》杂志，有一个宗旨是要『输入学理』，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知识，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，说『我们的《新青年》杂志，便曾经发行过一期『易卜生专号』，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，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《易卜生主义》。《新青年》也曾出过一期『马克思专号』。另一个《新教育月刊》也曾出过一期『杜威专号』。至于对无政府主义、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、日耳曼意识形态、盎格鲁·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，也就习以为常了。』（唐德刚编译：《胡适口述自传》，北京，华文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191页）。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，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『真理』的轨迹。三四十年间，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，到无政府主义、社会主义、马克思主义；从不列颠宪政学说，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、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，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，大致就是『输入学理』运动中的全部『西学』。

胡适一语道破地说：『这些新观念、新理论之输入，基本上为的是帮助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

问题。』胡适并不认为这种『活学活用』、『急用先学』的做法有什么不妥。相反，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『西学』的方法论，大多认为翻译为了『救国』，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，这就是『天经地义』。今天看来，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『实用主义』，是生吞活剥，不加消化，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，或曰：是『夺他人之酒杯，浇自己之块垒』。从我们收集整理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的情况来看，『民国西学』是一个比北大『启蒙西学』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认为『五四运动』及其启蒙大众的『西学』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，在北大的『启蒙西学』之外，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『民国西学』。或许我们应该把『启蒙西学』纳入『民国西学』体系，『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』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。

我们认为：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，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，引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，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，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。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，不中不西，并非简单的外来『冲击』所致，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。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、立场、方案、主张、主义……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，但都要在理解、消化、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，才会有更好的发挥。在这一方面，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，那便是『欲求超胜，必须会通；会通之前，必先翻译』。反过来说，『翻译』的目的，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，而非搬用；『会通』的目的，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，而是一种创新——『超胜』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。二十世纪的『民国西学』，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，值得我们捡起来，重头到底地细细阅读，好好思考。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，献弁言于此，是为序。

〔美〕季尼（E. P. CHEYNEY）著 余楠秋 等譯 譯

英 國 史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九月初版

譯者序言

『大不列顛者，雖荷蘭海岸不遠之一島嶼，爲全世人口四分之一之幸福所倚重者也。』

房龍 (註一)

一

昔日我國常以天之驕子自豪，而以隣族倫於禽獸。自清季以來，我國屢辱於外人，國人始反躬自問，吾族果有不如人者耶？是時，國人猶以爲外人所以窘吾者槍砲兵艦之強耳；文章道德，我國獨放異彩。於是國人言救國者，咸重兵工之術。其結果徒爲外國兵械製造所增加顧客，而資國內軍閥以工具，以屠殺同胞自逞。稍後始有注意於他國之政教者；制憲法，設民意機關，改良教育之聲浪日高，而制憲者抄襲歐美憲法而頒布之（註二），欲以之爲天下之繩墨，將何以異於閉門造車之倫耶？故憲法等於廢紙，絲毫無補於實際。竊以爲欲知一國政教之所由來，不可不問溯其民族歷史，否則鮮有不效其形而遺其神者也。讀史者知他國進化之途徑，非必吾人步武其後塵；不過見他國民族奮鬥之過程，可以啓迪吾人者良多。十九世紀德國經濟學家如李士特（List）等不主張德國盲從英國採用自由政策，而主張採用保護政策，卒使德國工商業之發達，駕陵英美之上，非熟知兩國之歷史背景者，孰能至此？故讀本國史可以促成民族之自覺；讀外國史尤足以

促成民族之自覺也。是故欲知外國政教之狀況，必自讀史始；欲知吾人今日之地位，及自今之設施，亦必自讀史始也。

二

今日與中國關係最密切之國有四：一爲日本，久有鯨吞東北，山東，閩越之野心，以解決其人口，原料諸問題；今面積四十餘萬方哩，人口三千餘萬之滿蒙（註三）不崇朝而失之矣。二爲俄國，其鐵道鄰繞我國西北疆土；其進攻也，旦夕間可直達我國境內，而我國毫無對付之策略。三爲美國，美國以地位遼遠之故，對泐我國疆土未能染指，然彼力持門戶開放之政策，即其經濟利益不肯放棄之表示，四爲英國，實際上西藏已降爲英國之保護國；一旦有事，將爲我國西南之大患。自長江以南，經濟勢力，英國實左右之。此數國者，與我國咸有切身利害；其國內現況，吾人不可不知；其何以達到現況之由來，吾人亦不可不知。故讀此數國之歷史，使吾人對於此數國之認識不無小補乎？

在政治勢力上，英國與吾華衝突最早，正式訂商最先（註四）；在經濟勢力上，英國實爲我華南部之支配者。吾國會爲代議制（註五），陪審判（註六），律師與狀師制（註七）等等之嘗試矣。此數者皆起源於英國。何以行於英國，則爲舉世儀範；而行之於我國，則爲世所詬病哉？此吾人不能不於兩國國情，及產生現在國情之過去歷史背景中求之者也。

英國與吾人之關係，既如此密切；研究英國史誠爲有益之事。英國史最爲人所知名者爲馬可梨 (Lord Macaulay) 及格林 (J.R. Green) 兩人之著作。格林之書 (A Shor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) 爲史學界開一新紀元，蓋昔日史書，多注重帝王將相，及戰功洪業而不及民間疾苦，故有「相斫書」及「帝王家譜」之目；史家之注意整個民族，及典章制度者，自格林氏始。第其書成於一八七四年，不但今日史學之觀點，略有變更；且自該時代以後之史實亦付闕如也。馬可梨之書，文字鏘鏘；與其謂爲史者，無寧謂其爲文學上之傑作也。

近日錢端升君譯屈勒味林 (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其父爲馬可梨爵士之外甥)，洋洋六十萬言，堪稱巨製。但以爲教本，殊有未宜。卷帙過巨，一也；敘事間博引古今，及本國外國之史實以比較之，初學者恒不知其史實之由來，殊有不便，二也；批評之成分多，而無遇事直書，善惡自見之精神，三也；專門名詞之選譯，尙有商榷餘地者頗多，如 Long Parliament 之譯爲「長國會」(通常譯爲長期國會)，Ordeal 之譯爲「嚴刑」(通常譯爲神判法)等，四也。雖然，譯事固難盡如人意，豈可苛責於人哉？拙譯錯誤，亦當不免，幸海內賢達有以正之，獲益多矣。

四

竊以爲歷史有供人爲文學鑑賞者，馬可梨之英國史是；有供稍具根基之人研究者，屈勒味林

之英國史是；有供學校教本之用者，本書是。爲教本之用者敘述取其簡明周到；一字一語均爲長久研究之結果，而其達到此結果之過程不必盡告讀者，蓋爲行文之便，且減少其瑣碎與紛亂之考據與史事，免讀者心緒益紊也。

本書全部約三十餘萬字，可於一學期內教授完畢。上古及中古之部分，文獻缺乏；然著者不以此稍忽。但近代與吾人之關係較深，且真實史料豐富，故特詳耳。著者雖自謙遜，稱其將外國事實與英國史無關者，盡力刪削；但英國與世界史完全相連，雖著者欲分之而不可得；如封建制度，教會組織等，英國史與整個歐洲史所共有者也。美國獨立，拿破崙戰爭，海外發展，世界戰爭等，其範圍幾及於世界全部。但爲篇幅所限，敘述略簡耳。房龍有言：『大不列顛者，爲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之幸福所倚重者也。』其在世界史中之地位於此可見。

五

本書譯文，全用文言，或有不能盡如原文語調之處；但不失原意爲標準。

本書間引用詩歌，譯文悉仿中國古體詩。此部分工作，多得王鏡清君之襄助，特此聲明，並誌謝意。

譯者所根據之原書，係 Edward P. Cheyney: A Short History of England, 1917年版。

註1 Van Leons, Geography, P.216

註二 清季以來，立憲之聲浪甚高；憲法未成而清社已墟。民國以來，立憲猶如築屋於道，久而無成。民國三年，頒布約法。十二年曹錕公布憲法，爲天下詬病。今國府方從事於立憲工作，而執其事者，類多書生，昧於實際。民國九年，省憲風行，湖南實首施行之。湖南省聞爲某鉅公盡一晝夜之力書成者，欲以此責天下共守，不亦難乎？

註三 滿蒙實日本所造之新名詞，指滿洲之全部及蒙古之東部。其在蒙古之勢力範圍見於一九一二年日俄所訂關於蒙古之密約。（見薛威靈謝德風譯俄羅斯與遠東問題第二九七頁。）按滿洲土地面積爲三六三，六一〇方哩，熱河爲八五，〇〇〇方哩，合爲四四八，六一〇方哩；滿洲人口爲二九，二九〇，〇〇〇人，熱河爲二，七一〇，〇〇〇人，共三二，〇〇〇，〇〇〇人。

註四 中國與外人發生正式交涉最早者爲與俄國所訂之尼布楚條約（一六八七），訂約之前亦發生軍事衝突。然此種衝突爲邊疆官吏之衝突，中俄兩國中央政府並未正式戰爭；且此條約對於後世之影響殊少，蓋中俄兩國之貿易，根本上不甚重要也。一八三九年至一八四二年之鴉片戰爭及南京條約則不然；割地通商，我國積弱之勢，自此始。

註五 代議制起源於英國，其發展之過程，本書敘述頗詳。其制度影響於現代世界各國之政體甚大，我國昔日亦有國會，省議會，縣議會等組織；最近又有民意機關之籌劃，均直接

或間接受英制之影響也。

註六 陪審判制亦起源於英國，參閱本書第一二四及一二五兩節。清季伍廷芳參與起草法案工作時，有採用陪審判之議，然未規入草案中。武漢政府時，徐謙爲司法部部長，已試行陪審判。但陪審制爲英國人民近千年來之習慣，一旦以之整個移植於我國，陪審員因缺乏訓練之故，往往不能盡如人意。

註七 英制律師分爲二種：一爲狀師，專爲訴訟當事人起草文件；一爲律師，可出庭爲當事人辯護。最近司法部當局，多受英美派之影響，故有「必先爲狀師二年，始能爲正式律師」之建議，或將成爲事實。因人爲政，而無全國整個永久之計劃，可嘆也已。

余楠秋（二十二、六、十五。）

原序

據予研究歷史與教授歷史之經驗，予確信某幾種基本事實，須使吾人絕對明瞭與熟悉。能知一國之自然界與政治地理，則歷史事實活躍於吾人之前；能知一國初期之政治與宗教組織，則對於以後之變遷可以瞭解。此予所以首先對於英國初期之制度與狀況，不惜費詞加以詳細明白之敘述也。

第二，在汗牛充棟之史料中，予去其明顯之事實，而留其有意義之事實——凡於英國國家之形成及特質有關者，或國家之普遍發展有關者，皆蒐集之。至於斷片故事與僅為離奇之事件，特別屬於軍事歷史方面者，語焉不詳，蓋欲對於真正之偉大運動與重要人物，多加注意焉。

第三，予之敘述，始終不離乎英國史線索，非與英國有密切關係之國家，不加論及。因英國有長久與重要之歷史，予認為言英國史者，宜注重簡單明瞭與繼續性，不當加以若干他國史之事實，使之益為複雜。

最後，凡其意義非本書所能詮釋之記載，予已省略，而對於本書所記載之事件，則作明白正確之解釋。此或有輕忽教師之嫌，蓋予所陳者，教師自能詳細剖解。但對於學生則為有益，當其自修之時，讀此課本可以明瞭一切，且造詣湛深之教師，正可多取材料，作進一步之解釋，言明